

《清明上河图》 ——中国古代城市智慧的结晶

葛剑雄

参观过中国馆的人无不对那幅会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其实，“会动”的技术含量并不很高，在世博园里，比那幅图更会动，动得更复杂的展品还可以见到不少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固然气势恢宏，但与沙特阿拉伯馆中的超大 3D 屏幕相比，那幅图的尺寸还相差甚远。而《清明上河图》真正吸引人的，还是图中的场景所显示的宋代开封丰富的城市生活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的智慧。

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，中国的城市历史正在不断改写和上溯，发现古代城市遗址的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。早期历史文献中一些有关城市的记载，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。

由于夏、商、周三代实行分封制，每座城几乎都是大小不等的国。国的数量越来越多，以至有“万国”之说。直到春秋初（公元前 8 世纪后期），有记载的国还有 1000 多个。尽管这些国名义上都从属于王和上级诸侯，但都有一定的独立性，所以无不将行政功能置于首位。一般来说，一座城中最重要的部分必定是主宰该城的诸侯或贵族的宫室，同时也是该城的行政和祭祀场所。城的四周一般围有城墙，有的还有相应的防卫工事。由于人口稀少，土地富余，城的范围可以划得很大，城内不仅有手工作坊，还可能农田。相比之下，普通居民的住所和活动场所反而显得微不足道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城市内部这样的结构和功能并不合理，却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，也体现了当时人的智慧。对每座城的居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生存和安全。这些都离不开君主和城墙的庇护，二者在城中占主要地位是顺理成章的。

自秦朝以降，中央集权制度越来越巩固，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等级制度也越来越明显。以西汉为例，全国 1500 多座城被分为首都，郡、国（诸侯国），县、侯国（列侯的封地）、道（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）、邑（皇后、公主等的封邑）这三个等级，逐级管辖。每座城都设有政府机构，都筑有城墙，宫殿（或衙署）与城墙成为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主体。

西汉的长安城是在秦朝废墟上新建的城市，事先就有严格的规划。长安城的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，但城内的主要部分是宫殿，长乐宫、未央宫、桂宫合计约 12.6 平方公里，加上衙署、仓库、兵营、监狱等设施，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面积供百姓居住。由于城内容不下众多的官员、贵族，他们大多居住在长安附近新建或扩建的“陵县”（因皇帝的陵墓而设置的县）内，以至形成了一个人口比长安还多的城市带。

东汉首都洛阳城的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，城内的南宫、北宫等宫殿占地约 4 平方公里，再除去衙署等建筑，留给居民的地方大概也不过三分之一。

首都以下的城市不需要那么大的宫殿，但作为地区性的行政中心，相应的衙署和其他行政、军事机构也会占较大面积，居民能享受到的设施很有限，城市生活的质量很低。

在一个农业社会，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，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。除了本来就住在城里，或不得不住在城里的皇帝、贵族、官吏、将士、商人、工匠等，其他人往往选择乡居，因为城市对他们并无多少吸引力，城市生活未必比农村生活更美好。

东汉末年开始的分裂割据，以及期间反复出现的饥馑、战乱使原有城市受到很大破坏，但一些新因素也导致了城市的进步。例如，各个政权为了增强实力，在城市建设中更讲究实效，避免形式。原有宫殿毁坏，或者没有能力建造新的宫殿和衙署，民居在城市中所占比例相应增加。人口流动增加了移民，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。佛教传入后，寺庙成为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首都与大城市中往往形成特殊的景观。

以北魏洛阳为例，据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，“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”。“自葱岭以西，至于大秦，百国千城，莫不欢附，商胡贩客，日奔塞下，所谓尽天地之区已。乐中原土风，因而宅者，不可胜数。是以附化之民，万有余家。门巷修整，闾阎填积，青槐荫陌，绿树垂庭，天下难得之货，咸悉在焉。”这种新气象，恰恰是以往的首都城市所未见过的。

唐朝的首都长安已经兼顾了城市的不同功能。

长安城由外郭城、宫城、皇城和各坊、市等构成，面积达 80 多平方公里。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，各坊分布于宫城、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，东西两市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，东西对称。整座城市规划整齐，布局严密，规模宏大，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。外郭城平面呈长方形，周长 36.7 公里。皇城也呈长方形，周长 9.2 公里。城内有南北向大街 11 条，东西向大街 14 条，两侧都设有排水沟。其中 5 条干道宽百米以上，特别是朱雀街宽达 150 米，两侧沟宽 3.3 米。这些街道将城内分为 110 坊，各坊建有坊墙、坊门，坊内为居民住宅、宫衙、佛寺、道观等。寺观遍布各坊，建筑豪华壮丽，有的占有全坊之地。著名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就建在慈恩寺和荐福寺内。西市南北长 1031 米，东西宽 927 米，东市面积大致相同，两市都筑有围墙，市内店铺、作坊密布，商业繁荣。3 条渠道将河水引入城内，以满足宫苑和景观用水，并汇成曲江池等风景名胜。

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、人口最多、设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，但封闭性结构还是影响了居民的生活，

也限制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，这些局限要到宋代才得到突破。结合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描绘和文献记载，包括首都开封在内的城市在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。

发达的商业、手工业、服务业使经济发展迅速，民众获得实利，生活水准提高，并且突破了城墙的限制，扩大到近郊。当时不少城市都在城外形成新的市场。南宋时，杭州的商店和市场不断向城外扩展，以至城外部分超过了城内部分。

道路、河流、桥梁、津渡形成便利的水陆路线，将各地的人员和物资引入城市。农村与城市间的交流频繁而密切，每天形成熙熙攘攘的人流。

流动人口迅速转化为移民，城市人口增加，人口的素质提高，多种文化相互竞争，形成新的城市文化。娱乐方式和设施名目繁多，餐饮等服务业应有尽有，佛寺、道观众多，城市居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得到享受。

中外史学家都认为，宋代的经济文化水准达到了新的高度，民众的生活富裕而舒适，社会繁荣而稳定。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城市人口及以城市为生的人口大幅度增加，商业和服务业扩大，城市生活水准提高。这些都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得到反映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不愧为中国古代城市智慧的结晶。

因此，尽管在宋代以后，首都等大城市依然沿袭了封闭性的政治中心的传统，但在经济发达地区，“清明上河图”的模式长盛不衰。如明清的江南，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，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，以精细农业和商业、手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，形成了崭新的城市和城市生活。

近代上海的崛起也得益于江南，上海人口的一半以上来自江南。由于这些移民熟悉商品经济和市场，迁入上海后如鱼得水，推动经济、文化蓬勃发展，使上海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性都市。

可见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成为中国馆的亮点绝非偶然，因为它正体现了“城市使生活更美好”的主题。